



華南研究會論文集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華南研究中心
敬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步與超越

華南研究會論文集

華南研究會編

書名：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

編者：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1998)

出版：文化創造出版社

版次：2004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62-86306-1-X

©2004 文化創造出版社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PREFACE TO TEN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I am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write this preface to this ten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the Circle. It is a particular joy to celebrate the growth of the Circle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It has been a particular personal joy to have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dedicated to a serious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local level. When I began some forth years ago my own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Macau I felt somewhat isolated. In time, however, I became friends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er scholars involved in similar studies as my own, people such as David Faure, Choi Chi Cheung, Leung Chor On, Lee Lai Mui, all of whom, I believe were at one time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They along with some of their colleagues in other local institutions organized the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younger members had been students of the older members. These young people after graduating wen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eaching in secondary or primary schools, pursuing an advanced degree, working in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y all had a keen desire to maintain their interest in local studies.

Though to my shame, I never acquired a mastery of Cantonese. I found when I attended the lectures of the Circle, I would find one of the members slip into an adjoining chair and quietly translating for my benefit. I greatly appreciated their thoughtfulness, but in one sense I felt uncomfortable because I felt that in doing so they could not give their full attention to the lecture. Sometimes, I would try to indicate to them that I was understanding the lecturer and that their kind intentions were not necessary, but seldom did this stratagem work. They were shrewd enough to know that, in spite of my attempt to laugh at the right place,

to need in agreement at a well made point of the speaker, I would not get much from the lecture without their help.

I also remember with great appreciation the concern and kindness of members of the Circle at a time I was experiencing a special challenge. I had suddenly lost most of my vision and had to use a stick for the blind. The Circle was having a barbecue, I was hesitant to go, but finally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friends I went. I found everyone helpful in assisting me over the rocks and the rough places on the path, and their being sure I had plenty to eat. During the half year I was practically blind, several members came to my home to assist me in continuing my research. Fortunately my sight was partially restored, so over the years I have been able to read through your publications of the progress you have made — the visits and study tours, seminars, development of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universities, archives and scholars, the creation of your own Research S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and special publications. A great deal has been achieved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This preface is a personal reflection drawing upon my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As an old man I rejoice that Hong Kong has a young vibrant group of students, ex-students and scholars doing pioneer work in local studies.

All my thanks for pleasant memories. All m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upon which you are now building. All my wishes for an increasing fruitful future for the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Rev. Carl T. Smith

Hong Kong, 10 Mar. 2002. My eighty-fourth birthday.

華南研究會十週年紀念刊序言*

為華南研究會的十週年特刊寫序言是我的榮譽，看見華南研究會的茁壯成長使我異常喜悅。

能夠見證一群年青中國人投入中國地方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喜悅。回想我在四十多年前開始研究香港與澳門歷史的時候，我有的是一份孤寂的感覺。但當我逐漸與一群年青學者成為朋友後，感覺便開始改變。他們人數慢慢增加，與我的研究興趣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蔡志祥、梁礎安、李麗梅與香港其他大專院校的朋友組成華南研究會。會員中有年青的學生和比他們稍為年長的老師。這些年青人在畢業後各有發展，有的成為中學或小學老師、有的繼續深造、有的在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工作，但他們都渴望維持自己在地方研究方面的興趣。

我感到慚愧的是我沒有掌握好廣東話。當我參加華南研究會的講座時，每次都有一位成員悄悄的坐到我旁邊的椅子上，靜靜的為我翻譯演說內容。我非常感謝他們的誠意，但卻使我感到過意不去。因為翻譯的工作，使他們不能集中精神了解演講的內容。有時候，我嘗試讓他們知道我是明白演講內容的，使他們不用費神為我翻譯，但我這個策略很少成功。我雖然試圖配合講者的演說內容在適當的時候發笑；然而，仍是都逃不過他們敏銳的觸角，他們知道如果沒有他們提供的幫助，我能掌握的演講內容是很有限的。

我還記得我曾經歷了一個很特別的挑戰，這也喚起我要感謝會員們對我的仁慈和關懷。那時候，我突然失去了視力，要靠拐杖引路。當時華南會舉辦了一個燒烤活動，我本來不打算參加，但在朋友的鼓勵下，我還是去了。他們幫助我繞過路邊的石頭，跨過不平的小路，不停為我增添食物。在該半年裡，我實際上是個瞎子，但有幾位會員跑到我的家提供協助，使我可以繼續研究工作。幸運地，我後來恢復了部份視力。在過去幾年裡，能夠閱

* 本序言由廖迪生翻譯。

讀到你們出版的書刊及在進展路上的成果——訪問和考察研究、講座、發展與中國大陸各大學、檔案館和學者的接觸和合作、在科技大學設立資料中心、出版通訊和叢書等。華南會在很短的時間，達到了很多成就。

這序言是我個人回憶和觀察的回響，我這個老人很高興香港有這樣的一群年青而充滿活力的學生、已畢業的學生和學者從事開創性的地方研究工作。

我衷心感謝這些欣喜的記憶、我衷心祝賀這個你們仍在建築中的堅實基礎、我衷心希望華南研究會有一個成果豐碩的將來。

施其樂神父

(寫於香港 2002 年 3 月 10 日)

84 歲生辰)

目錄

Preface to ten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Rev. Carl T. Smith)

華南研究會十周年紀念刊序言（施其樂神父）	i-v
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蔡志祥）	1-8
告別華南研究（科大衛）	9-30
廿載華南研究之旅（蕭鳳霞）	31-40
文化人類學與華南研究（廖迪生）	41-43
日本之華南地區民俗宗教研究	
——以香港及廣東地區為中心（志賀市子）	44-59
香港道教的認識	
——道堂文獻的蒐集與研究（游子安）	60-84
反省香港華人民系及其生活史研究（芹澤知広）	85-94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stoms and practices in	
Hochiminh city (Tran Hong Lien)	95-104
碩果纍纍——貴州「六山六水」民族綜合考察簡介（李廷貴）	
	105-113
雲南社會歷史文化研究概述（王筑生、楊慧）	114-127
廣東省民族研究所概況（朱洪）	128-139
90年代以來潮汕歷史文化研究綜述（黃挺、陳占山）	140-156
福建學者的華南區域史研究概況（鄭振滿、劉永華）	157-169
從地方史到區域社會經濟史	
——江西師範大學的區域社會歷史	
文化研究機構、主要成果和資料（梁洪生）	170-181
南昌大學江西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簡介（邵鴻）	182-186

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

蔡志祥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一、華南研究：地域和概念

華南研究可以從地域和概念兩個層面去理解。狹義來說，華南包括了大庾嶺以南，廣東和廣西兩省的地方。廣義來說，假如我們考慮到一般人相信的所謂南北移民的歷史過程的話，華南也許可以包括長江流域以南的地區。1990年香港中文大學陳其南主持的華南研究計劃就包括了安徽、福建、臺灣、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廣大的地方。在90到93年間參加計劃主辦的工作坊的，也包括了從事江西和粵東客家研究的學者。此外，濱下武志指出，假使我們從海洋貿易歷史的視角，考慮到人和社會如何透過海洋貿易而累積財富，華南也許可以指福建、廣東、海南等沿海省份（《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995年，第一期）。同樣地，香港科技大學的華南研究中心把它們的研究地區，界定為「從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臺灣以至海外華人社會」。華南所指涉的地理範圍，既然如此地隨著研究者的視角而變化，因此，華南也許可以更容易地從概念的架構去瞭解。就如濱下武志指出，地域研究並不一定專指一個特別的實在的地理範圍。它可以是從研究主題引申出來的空間。因此，方法論也許可以是華南研究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涉範圍。

在香港的華南研究，也許可以視為人類學和歷史學的長期結合的成果。就如蕭鳳霞在1995年憶述她在華南地方進行研究的十年歷程時指出，華南研究計劃是一群結合人類學和歷史學者的合作計劃。她們分享了對傳統學科界線的不滿，追求超越傳統學科壁壘的可能性（《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995年，第一期）。1988年，主要由本地一小群人類學和歷史學學生組成的華南研究會，更明確的指出學會提倡用科際整合的方法研究香港、華南以至華人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學會組織田野考察工作坊，結合參與觀察和口述歷史的方法，推廣對地域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理解（《華南研究會宣

傳單張〉)。換言之，學會把華南放在一個連接中國和海外的廣大脈絡下，把焦點放在「地域社會」，從而強調一個結合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地方文獻及檔案運用與解讀的方法。就如科大衛在「地方文獻和華南研究」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中，提出華南的地域和族群界線的流動性。(1993年1月6日)他和蕭鳳霞進一步提出一個文化的解釋，指出華南毋寧是一個歷史的建構，是以地區取向來理解中國的歷史過程的試驗場。(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p.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打破傳統學科的框架，結合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從精緻的地域研究延伸到文化國家的建構，是華南研究會立論的主旨。從另一方面來看，華南研究會的成立和發展，不單可以觀察到傳統學科壁壘的嚴森；從人脈關係以及物質環境對一個志願團體的影響，學界和非學界的矛盾，我們也許可以淺嘗理論和實踐，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困境。

二、華南研究會：潮流與歷史

冼玉儀指出在1950年代，有5群學者致力於推動本地史和香港史的研究。其中兩群學者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羅香林、林天蔚、簡又文、饒宗頤等中國國內的主流歷史學者，把香港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他們的興趣是歷史文獻的文本分析，他們關心的是中國歷史。他們認為族譜是理解中國地方歷史最好的工具。透過他們的努力，在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建立了香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族譜收藏庫。(Elizabeth Sinn,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 review,”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34, 1994: 148-152)

另一方面，隨著1949年在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的困難，很多人類學者嘗試在中國大陸以外，尋找可以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試驗場。在50和60年代，很多西方和日本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擁至。他們對宗族社區和節日的精緻的民族志和分析，建立了香港和華南研

究的重要基礎。

香港歷史文化或地域歷史文化並沒有成為學界的關注點。香港只不過是作為瞭解中國的過客。地域界線就如學科界線一樣，壁壘分明。然而，在地方文獻收集和民族志調查兩個傳統下，加上本土化意識的動力，金耀基等在中文大學任教的社會學者，在 60 年代後期進行了一系列新社區的調查。至於本地學者，以新界地方為主體的研究，也許可以說是從 70 年代末開始。

華南研究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末的兩個動向。首先是以科大衛為首的口述歷史計劃和香港地方文獻、碑銘收集計劃。這兩個計劃把地方文獻從傳統的族譜，拓展到書信、帳簿、婚帖，訃告等鄉民在日常生活中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資料。同時，提出了鄉民對本地歷史的詮釋，是士紳階層述說的地方歷史之外，建構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要根據。另一個重要的動向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高流灣研究計劃。1980 年，人類學從社會系獨立出來，從輔系課程提升為主修課程。高流灣研究計劃是第一個在本地實行的田野調查訓練。

這是一個上層意識和基層建構角力的時代；這是一個士紳階層卑視鄉民社會的時代；這是一個大傳統和小傳統斷裂，都市凌駕鄉村的時代。口述歷史計劃雖然如冼玉儀所說，加深了我們對新界以至傳統中國鄉村生活的理解，(Elizabeth Sinn, 上引文, 1994, 頁 157) 但是，隨著 1988 年科氏離開服務多年的中文大學，口述歷史和文獻收集的工作並沒有繼續下來。

一個建構的成敗與有否制度化的支援有很大的關係。人類學系的高流灣研究計劃也不例外。

人類學究竟應該從事「他人社會」的研究還是本地「自我社區」的研究？究竟「我」和「他」的界線應該是如何劃分？70 年代末期，當時大部份的中文大學人類學教學人員都主張學系應該集中研究以瑤族為主的中國少數民族。已故的王崧興教授秉承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濁大計劃」的傳統，是唯一的例外。他主張在中文大學建立一個香港地區的區域檔，從事漢人社會的研究。當時在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自 50 年代以來，從事漁民社區研究的故華德英教授(Barbara E. Ward)是少數支援王氏的人類學者。在他們的建議和支援下，我在 1979 年夏天，第一次到香港新界西北，塔門島對面的漁民村落高流灣參觀當地舉行的安龍清醮儀式。是年秋天，身為人類學系的助教，我建議以高流灣為基地，進行長期的社區調查，同時作為訓練學生田野調查方法的場所。在 1979 到 1981 兩年間，我和約十位輔系的同學(包括如張兆和等一些在翌年轉為主修的學生)，不斷摸索田野調查的方法。我們在冬夏的假期自資租住高流灣的房子。從事家戶、生業的調查，收集民俗資料，記錄節日和婚喪儀式。在平日，凡有重要的節日或事件，我們都有同學前往記錄。小組也從事了一些社會服務的工作，包括贈送玩具、放演電影、籌辦文娛節目和球類比賽。同學用調查的結果，寫了一些報告。此外，當時建立了一個傳統，就是每個月由同學報告當月調查結果或邀請學系的老師講演有關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調查的資料藏在人類學系。我們希望可以成為王先生希望建立的區域資料庫之一。

1981 年秋，我離開中文大學往日本深造。華教授在 1983 年初仙遊，王先生也於不久離港，往日本任教。雖然一部分同學仍然繼續和高流灣的鄉民維持友好的關係，在沒有人事和建制的支援，加上一些同學畢業離校，計劃很快就結束了。兩年多收集的調查資料，除了一部分由後來的助教保存下來，輾轉重回我的手上外，大部分都遺失了。

口述歷史和高流灣兩個計劃雖然可以說是慘澹收場。但是，科大衛後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精深研究，無疑是建基於此。此外，兩個計劃刺激了本地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興趣。如何使年青學生畢業後，仍然有志從事地方研究是我們所關心的。1986 年，兩個計劃的一些成員，包括李麗梅、科大衛、梁礎安和我，建議出版研究刊物，一方面提供業餘有志的青年學生一個出版的園地；另一方面，鼓勵大學畢業的學生在工餘時候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可是，沒有建制支援的出版計劃並沒有成功。1988 年，我從日本畢業回港，參考了在日時參加的一個以對中國歷史和人類學研究有興趣的年青研究

生為主的「仙人會」的經驗，和李、科、梁等討論的結果，認為只有通過建制，才能為年青學者提供一個平等的發表論文，交流心得的園地。我們認為只有通過發表和相互批評討論，年青學者才敢於把研究所得公開。華南研究會的前身，「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就此註冊成立。我們把會費定得很低(港幣 10 元)，主要用作支付郵費。學會除了定期舉辦學術會議和田野考察工作坊外，在游子安君的努力下，自資出版了第一期的「華南研究」。

1989 年我前往澳門教學。李麗梅繼任會長。兩年後，我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學會的講演也定期在科大舉行。我們當時的想法是隨著我們一些朋友進入大學任教，我們可以以大學為講座的基地，每年輪流在不同的大學舉行。然而，93 年以後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只是一個理想。學會在其他大學並沒有得到同樣的支援。學會和科大的千絲萬縷的關係，給人以學會是科大的印象。同樣的，學會也面臨一個對象的問題。我們逐漸走進學術的胡同，業餘的研究者也逐漸離開我們。

三、90 年代的實踐：理想與困境

90 年代是華南研究的發展和挫折的 10 年。一方面，在當時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陳其南和耶魯大學的蕭鳳霞兩位教授主持下，結合安徽、福建、廣東和香港的年青學者，進行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的比較研究。國內的前線學者包括安徽江淮學刊的鄭立民、廈門大學的陳支平和鄭振滿和中山大學的陳春聲和劉志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羅一星等。比較研究的地域包括安徽(鄭立民、陳其南)，福建(陳支平、鄭振滿)，潮州(陳春聲、蔡志祥)，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劉志偉、羅一星、科大衛、蕭鳳霞)。當時建立了一個工作坊的傳統，把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在同一個試驗場上，以比較的角度，互相切磋學科的視點和方法。各研究者把自身的研究場所，展示在不同學科和地域的研究者面前。通過日間的田野考察和晚上的討論，把新的視野帶進，也把不同地域的刺激帶出。這個計劃，在個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共同的關注點，如國家透過什麼的制

度和形式進入鄉民社會。同時，因為其他的社會經濟史學者和研究生的參與，建立了一個歷史學和人類學結合的新氣象。

1993年陳其南離開中大，計劃也隨而中止。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建立。它的人文學部嘗試把人類學和歷史學組合起來。由1993年初的「民間文獻和華南研究」的研討會開始，和華南研究會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田野工作坊、講座等。在1993年開始，舉辦每年一次的「社會史和文化人類學」講座系列。在科大和華南研究會的共同努力下，把年青學者和研究生重新帶到試驗場上。1994年舉辦了為期3天的「在鄉商人」研討會以及在福建和潮州的工作坊。1995年，我們在牛津大學開了一個比較福建、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國家和地方社會的會議。在牛津，中山大學的陳春聲和劉志偉、牛津大學的科大衛，東京大學的濱下武志、香港科技大學的廖迪生和我在會餘時候討論的結果，在資金來源仍不明朗下，決定出版季刊形式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又在每年耶誕前在中山大學舉行一天的會議和一至兩天的工作坊。會議和工作坊由中山大學歷史系、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廣東省中國經濟史學會和華南研究會合辦。主題由1995年的「16世紀嶺南」到1999年的「20世紀嶺南」。由2001年開始，改以「華南研究年會」的形式繼續下去。同時，在濱下武志的推動下，建立「華南研究中心資料站」系統。我們希望通過收集和編印民間文獻，使到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從資料的交流和互通下，節省更多的研究時間，從而可以更廣更深地從事學問的探索。我們也希望通過不同的形式，提供年青的或業餘的研究人員交流和發表的園地。

1994、95年，我們用自己微薄的工資，用我們自己的研究經費，加上科大人文學部的贊助(主要是資助研究生參加我們的活動，和1995年召開的「經營文化」會議及出版相關的論文集)，建立了非正式的網絡，舉辦一連串的會議、講座和田野考察活動。這兩年我們不斷受到挫折之餘，也嘗到交流互動的興奮。

建立可以讓研究者利用的資料站、支援前線調查者的田野考察和資料收集、贊助學生參加田野工作坊、出版通訊和資料集等，都

需要建制和人事物資的支援。華南研究會的成員，尤其是馬木池和黃永豪二君，無私的貢獻了他們寶貴的時間。但是，志願團體性質的研究會的微薄經費並不足以支援多元化的活動。1997年在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丁邦新教授的支援下，建立了華南研究中心。我們有了一個基地，也有了較多的經費讓我們聘請兼任的研究助理、出版通訊和資助籌辦田野工作坊。

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無疑把我們從過去非正式的關係網絡，建立成正式機制。從零開始，長成為細小的麻雀。

90年代的發展、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也同時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1999年中，我們曾經邀請一位在另一大學任教的友人在《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發表文章。朋友的回應是，他的上級會質疑為什麼要在科技大學的出版物發表文章。在華南研究和華南研究會開始得到建制的支援時，它們亦面對下面的一些問題：

(1)身分認同和學術界線的問題：人是研究發展的重要關鍵，但是人所屬的制度和機構，往往制限了活動的彈性。在這十年裏，我們感覺到華南研究會和科大的關係令到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因為學院的壁壘而對參加工作坊等活動有所猶豫，同時也把研究會的事務置於次要的位置。我們看到和中國大陸學界的交流日多的同時，香港學界間的門檻更高。

(2)對象和方向的問題：冼玉儀在「香港創造，創造香港」的講演中指出，面向學界還是服務社會常常是本地出身的大學教學人員要面對的矛盾。(1997年1月25日)面對教資會審核的壓力，很多大學的友人對無償的或「非學術」的貢獻，感到無力。此外，學院化的問題以及過於學術性的走向趕跑了業餘的興趣者。90年代，香港很多文化機構如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博物館等都積極舉辦很多以教師、學生和一般香港居民為對象的講座和考察。然而，我們認為業餘研究者是最前線的知識提供人的想法，在這樣的新環境下，他們只是一些「消極的知識接收者」。

四、視野：超越與包容

1999年「19世紀嶺南」會議的總結討論上，陳春聲、劉志偉等提出「超越嶺南」的看法。(1999年12月18日)超越和包容是華南研究發展的重要視野。培育年青學者，鼓勵業餘的草根的研究者；提供跳出圖書館、創造走向民間的機會、結合文獻資料和田野考察，建立新的研究範圍和視角是華南研究會建立的理念。華南研究會的將來，是要超越一個地域，一個概念和一個聯繫。在制度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人事和物資的支援，我們也需要跳出山頭主義的制限，以及平行和結合學界和非學界之間的互動。

2000年6月16日牛津

告別華南研究

科大衛

牛津大學

蔡志祥兄希望我可以寫一篇比較理論性的文章慶祝華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想來想去，我感覺理論性的文章很難寫。所以只能以一篇反省個人經驗的報告應付。但是，談到個人經驗，必須考慮以後的路向，所以題目就變成這篇文章現在的樣子。

談到理論，可以說華南研究深受人類學者費理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華德英(Barbara E. Ward)的影響。費理德曼我沒有個人接觸的機會。華德英則在她去世前一兩年，我們同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時我們剛開始新界口述歷史計劃。在學校和田野我都有得益她的經驗的機會。我相信我可以從費理德曼的家族理論轉到社會認知理論是受她影響的。

費理德曼認為華南社會結構的主體是一姓一村的單位。這個論點，不等如說每一條鄉村只有一個姓氏，而是一姓一村是鄉村發展的一個共同方向。從這個共同點，費理德曼總結人類學和歷史學對中國宗族的概念。一直以來，很多學者都已經發表過有關家族運作的論著，大家都知道宗族、祠堂、族譜、族產，在中國社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費理德曼最強調宗族與地方社會的結合。不但如此，更因為他能夠說明宗族與地方社會的結合，他能夠說明整個宗族概念的運作。地方上的宗族是個控產機構。地方宗族可以連起來建立地方社會以外的宗族組織。所以他把宗族分成地方宗族、中層宗族、和高層宗族。宗族的層次越高，越脫離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在大城市(例如廣州)建立的祠堂(例如陳家祠)，變成小部分人的聯繫機構，而不是鄉村的管理組織。

費理德曼的理論在西方中國社會史有很大的影響是有多種原因的。其一，是因為在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不少研究者對當時還是比較有勢力的「控制論」(例如蕭公權的《農村中國》)已經不滿。當時除了費理德曼外，還有史堅雅(G. W. Skinner)對農村市場理論的影響。可以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皇權對社會「控制」，